

## 红军挺进师在永嘉(瓯海)纸山<sup>(1)</sup>

一九三七年春，国民党成立了温区临时肃反委员会办事处，用来对付我党的活动。五月底，反动闽赣浙皖四省边区主任刘建绪来到永嘉、瑞安一带督战，令闽浙敌军向我发起总攻，直到“七·七”芦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这次“清剿”斗争中，敌人除了在军事上逐步缩小包围圈，分进合击外，又强迫群众组织“联甲”及“剿共义勇队”、壮丁队，进行搜山、移民并村，将边区零散的房屋、茅舍一律烧掉，人民的油盐柴米按人头逐日分配，还公布所谓窝“匪”、藏“匪”等十条所谓“杀无赦”的“禁令”<sup>(4)</sup>，欲把群众和红军隔开，妄想“竭泽而鱼”，消灭红军挺进师及其游击队。

陈铁军同志作为我方同国民党在温州谈判的代表，回来向刘英同志汇报与国民党当局进行和谈的情况以后。刘英同志准备渡过瓯江到青田、缙云、永康一带去找谢文清、刘达云、粟裕同志。六月初，省委机关和部队三十余人，一挺轻机枪，从湖基驻地出发，经永嘉纸山的山后、马鞍岩、屿山、五凤垟、包岙，以一整夜的行军，到达黄庄岭头(即港头岭背)时，已是次日天亮。省委机关和部队即在岭头王阿余的独户茅屋里休息，待天黑后，从港头岭下山，渡过瓯江北进。部队在休息时，被敌人发现。时近中午，刘英同志正在察看地图，研究工作，敌人一百多从港头岭一面的山沟里爬上来，从我部驻地背后包剿过来。因昼夜行军，战士都很疲劳，岗哨也瞌睡了。当我部发现敌情时，敌人离我只有几十米。我部在组织突围中，队伍被敌人冲垮，

陈铁军同志在这次突围战斗中，脚跌伤而掉队，被敌人抓走。几位同志负伤，张金发志同把两位(即詹肇熙、林作易)重伤员安排在包岙银足寮内养伤，给了哪和尚三十枚银元。刘英同志及其部队又撤回五云山，与龙跃、程美兴同志会合。这次突围，我部丢失了二张地图。

七月八日，我闽浙临时省委向刘建绪发出通电，再次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二十七日，刘建绪迫于形势，才要求和我方重开谈判。

一九三七年八月底，浙南地区国共合作谈判达成协议。省委机关由青田、永嘉、瑞安边境的纸山，以昼夜行程赶回平阳北港，集中部队。工作布置就绪后，则分别派人往浙西南去找粟裕、谢文清等部<sup>(5)</sup>。九月，省委派程美兴、张金发同志带一个工作组，到五云山和永嘉纸山，一面收容伤病员，一面作社会调查，宣传抗日，建立革命游击根据地。

一九三八年三月十八日，浙江红军部队五百多人(包括浙南地区游击队，抗日救亡干部学校的部分同志)，由粟裕、陈铁军(陈于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七日从衢州回到浙南)等率领，从平阳山门出发，北上抗日，四月十八日到达安徽歙县岩寺，被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第三营，粟裕任第二支队副司令员。红军部队离开浙南后，刘英带领少数武装人员和一些地方干部继续坚持在浙南、永嘉等地，领导主持浙江工作。

刘英同志率领的红军挺进师存永嘉纸山，经历了延续长达八个月之久的第二次扫“清剿”斗争，有力地牵制了敌人，在一定程度上策

应和支援了党中央和主力红军北上的战略行动，也在一定程度上配合和掩护了邻近兄弟游击区的斗争。同时，不但粉碎了敌人的疯狂“清剿”。而且更加强和锻炼了党的组织，创造了不少新的工作方式与方法，保存和发展了抗战的力量，开辟了新的工作地区。使刘建绪呈报闽浙红军只剩七个的立功企图，事后不得不招致蒋介石的严厉指责(6)。

红军挺进师在永嘉纸山的活动，一度打破了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给人民群众以深刻的印象。当时，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欺骗宣传，群众对红军有误解，以为是杀人纵火的军队，普遍怀有恐怖情绪，一听说来了红军，就避之若蝎。但是，红军挺进师以自己英勇善战，纪律严明，一秋毫无犯的革命行动，使群众正确地认识了红军是抗日的队伍，是穷人翻身求解放的队伍。广大革命群众从红军挺进师身上看到了希望，认为共产党和红军是可以信赖的，从而使红军挺进师和我党组织在永嘉纸山坚持斗争，赢得了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这为后来我党在这一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奠定了扎实的群众基础。

红军挺进师在永嘉纸山，努力宣传党的路线和政策，发动群众，唤起群众的觉醒，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和抗日热情，把抗日救亡运动推向高潮。刘英同志每到一个地方，就向当地群众宣传“劳苦大众要团结起来，同反动派斗争到底，才能求得自己的解放。”“枪口对外，停一止内战，一致抗日”等等，充分揭露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行径。尤其是在“恐日病”和“亡国论”到处流行的时候，这些宣传大大增强了人民群众抗战的决心和信心。这是红军挺进师在纸山活动

的重要意义所存。

刘英同志在永嘉纸山活动期间，常驻山马路、茅坑底、犁头垟、石榜山、鲤鱼脊、白脚坳、马鞍岩、岷岗、金堡、西竹。他常常亲自找各地政治交通员谈话，了解各方面情况，分析形势，部置全省工作。刘英同志把培养当地干部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他经常同党员、干部促膝谈心，培养了一大批当地干部，成为革命的骨干；有时他还找那些有影响的人物谈话，凡和刘英同志谈过话的，对他无不称赞佩服。为了帮助恢复和发展党的基础组织，他经常在晚上召开座谈会，亲自向有关人员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做了不少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在犁头垟、岩门、石榜山、马鞍岩、白脚坳、西竹、金堡建立了党支部和政治交通站，促进这些地方的党组织有了新的发展，使纸山在后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成为我党浙江省委、浙南特委、永嘉县委一个巩固的游击根据地，纸山人民在革命斗争历史上的作用和功绩是永不磨灭的。

(郑恩光)

这时，刘英同志鉴于敌人“围剿”的重点是原省委活动的主要地域，也就是浙南游击根据地的基本地区，他就决定越过飞云江转移到永(嘉)瑞(安)之间去继续主持领导工作，这是对的。

——粟裕《回忆浙南三年游击战争》

(一九三七年九月)我们终于依依不舍地告别了门陈乡亲，翻山越岭，沿着崎岖的山路南下，绕过遂昌县城，经过石练、湖山、王村口、

大潘坑、船寮、青田、大岙，到达飞云江南岸，和刘英同志派来的联络员相遇了。于是一同奔赴平阳北港和刘英同志等会合。

### ——粟裕《回忆浙南三年游击战争》

#### 注释：

①红军挺进师的前身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团。这个部队原来是方志敏同志的红军第十军，一九三三年二月，从赣东北苏区调到中央苏区后，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红十一军，当年十月改编为红七军团。这个部队素质优良，很能打仗，特别是善于打游击战。在中央苏区反对蒋介石第四、五次“围剿”时，打过不少胜仗。一九三四年六月底，它参加在建宁方面的保卫战中，被紧急调回瑞金，接受新的任务，命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先遣队6千多人，秉承中共中央、苏维埃中央政府和红军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抗日意旨，于一九三四年七月六日由红都瑞金出发，实行北上抗日。因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使北上抗日先遣队不幸于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一日在怀玉山被七倍于我的敌军包围，肉搏血战数昼夜，最后在粮尽弹绝的情况下，除政委乐少华，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等同志率领一部分队伍(主要是伤员和军团直属机关，四个已无弹药的重机枪连)做为前卫部队先期出发，回到闽浙赣苏区外，大部分队伍都不幸损失了。原七军团军团长寻淮洲同志在战斗中牺牲。北上抗日先遣队红十军团的最高领导者闽浙赣皖政治委员会主席方志敏同志、军团长刘畴西，师长王如痴，政治保卫局长周群等同志均在这次战斗中不幸被俘，后来又都在南昌英勇就义，光荣牺牲。

△现在瓯海县(原永嘉)的泽雅区，包括藤桥、三溪区和瑞安县湖岭区的一部分区域，即瓯海、瑞安，青田三县交界的崎云山、凌云山、雪尖山麓，人们历来称之为永嘉纸山。

②第一纵队队长朱宝芬，政委刘达云；第二纵队队长李重才，政委洪家云；第三纵队队长刘汉南，政委方志富；师部机关人员，编为政治连，连长王维信，政委宗孟平。

③一九三五年十月五日，挺进师在福建省寿宁县郑家坑村与闽东独立师一部及其领导人叶飞等胜利会师。鉴于对敌斗争统一行动的需要，双方领导人举行了联席会议。会后成立了闽浙边临时省委，并以刘英为书记，粟裕为组织部长，叶飞为宣传部长兼少共(团)临时省委书记，并相应成立浙闽边临时省军区，粟裕任司令员，刘英兼政委。在闽浙边临时省委成市后的半年多时间内，浙江与闽东两方面互相配合、支援、帮助，对当时的革命斗争，曾起过显著的作用。但是后来双方主要领导人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分歧，严重影响了团结，于一九三六年下半年发生了“南阳事件”，致使矛盾激化，导致了临时省委的解体，给革命事业带来不应有的损失。以后，浙江方面(包括划归浙南领导的福鼎地区)仍沿用“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这一名称，直到一九三八年五月“中共浙江临时省委”成立，刘英仍为书记，一九三九年七月在平阳北港风翔乡的官尖、马头贡召开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刘英当选为省委书记。一九四二年二月，由于叛徒出卖，中共浙江省委机关在温州被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刘英同志不幸被捕牺牲。

④所谓“杀无赦”，就是(1)窝“匪”藏“匪”者杀无赦；(2)资“匪”助“匪”者杀无赦；(3)给“匪”通风报讯者杀无赦；(4)替“匪”送信带路者杀无赦；(5)知“匪”不报者杀无赦；(6)参加“匪党匪军”组织拒不自首者杀无赦；(7)隐瞒户口或家中有人来往不报者杀无赦；……。

⑤⑥刘英《北上抗日与坚持浙闽边三年斗争的回忆》。